

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 与农业政策选择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OICE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CHINA

徐志全 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序 言

牛若峰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本书是徐志全博士的新作。作者以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与农业政策选择为对象进行了深入和开拓性研究,结果写成这本别具特色、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

作者指出,工业化非均衡推进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中国工业化非均衡程度在大国中是罕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总体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分区来看则是工业化三个阶段同时并存。作者按照设定的标准和评价指标,分别以省(区、市)和县(市)为地区单元进行量化分析,给出了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省级单位数和县级单位数,并绘制出非均衡分布图,使人一目了然,倍感清晰。这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站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着重分析揭示了我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各类区域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指出了工业化发达(第一类)地区出现低价值的传统产品生产萎缩现象,描绘了工业化第二、第三类地区农业动态格局和发展趋势,分析了他们的原因,并指出了不同的政策目标、重点和策略。从而为各级决策者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政策,进行分类指导,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作者特意提出了“我国应当实行适度的农业支持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建议,此点更具宏观指导意义。

总之,这本创新佳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其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效法。作者勤奋研读,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一丝不苟,这种精神十分感人。

志全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临纸思索,谨录上述,作为回应,并表推荐之意。

前 言

一、主题、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工业化非均衡推进在世界各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平衡的程度在各国之间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工业化,目前一小部分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成熟发展阶段,一部分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稳定增长阶段,还有一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起步的资金原始积累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即工业化三个阶段并存。所以,中国工业化的非均衡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工业化三个阶段并存在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对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政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而如何进行分类,如何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指导,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这个要求,本文研究的主题确定为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进程中,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回答三个问题,即中国工业化非均衡程度的量化情况如何?中国工业化非均衡推进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如何?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中农业政策取向如何?

本文的全部内容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以省级单位为地区单元对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中三种类型地区进行比较;第三章以县为地区单元对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中的三种类型地区进行比较;第四章为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是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中的农业政策选择;第六章给出基本结论。

对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按地区为单元进行分类,首先要解决分类标准问题。所以,第一章在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例,阐述

了本文研究内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后,在第二节对工业化非均衡进程的概念、工业化阶段和计算标准进行了界定,第三节对研究方法作了介绍。我们把工业化定义为在经济发展中工业份额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转变的过程。工业化非均衡进程的涵义比较宽,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我国地区之间增长速度与水平及产业内部协调发展问题。

工业化阶段分为起步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化中期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工业化后期经济成熟阶段。以核心指标划分工业化阶段:工业净产值(增加值)占工农业净产值(或增加值)的比重小于60%为第一阶段;大于等于60%,小于80%为第二阶段;大于等于80%为第三阶段。

衡量地区之间工业化非均衡程度的指标体系的确定原则是把握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完整地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全面反映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的特点;注意指标的可计量性和数据资源的有限性;指标体系要包括足够的信息量。指标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工业产值比重;主要辅助指标:人均GDP、非农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消费水平、儿童入学率、卫生技术人员数量等;补充指标。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结合。地区之间工业化差异的测算采取绝对差距、相对差距和总体差距相结合的方法体系;以工业化程度为标志,分别以省(区、市)和县为地区单元进行分组。

按照上述方法,第二章分为四节,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地区单元,通过对三种类型地区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的基本特点。中国工业化从1953年起步,经过38年的快速推进,1991年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比重达到60.5%,走完工业化第一阶段的路程,跨入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1994年全国一、二、三类地区省级单元分别为3个、11个和16个。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为一类地区。三类地区主要分布中西部。虽然一、二类地区的省级单位在数量上还不足全国的一半,但人口已超过全国的一半。中国工业化进程表现为一、二类地区比重逐步增加,三类地区

比重逐步降低的过程。

为了对各类地区间的差异进行量化,我们对各类地区间,各类地区内部、各省级单元间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及40年来的变化作了计算,虽然方法和反映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地区差异与变动格局的结论是一致的。从以省为地区单元观察,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的基本特点是: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成熟发展阶段的一类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的二类地区与处于工业化起步的资金原始积累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三类地区并存。中国工业化的非均衡进程,突出地表现为三种类型地区之间的差异。

第一,各类地区间差异巨大,特别是一、三类地区之间,二、三类地区之间及一类与二、三类地区之间差异悬殊。

第二,这种差异是全方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无论是在地区间、产业间,还是城乡间,都是不均衡的。从空间看,各类地区不仅核心指标,即工业净产值比重差距大,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工业净产值、非农业就业人数比重、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城市人口比重、人口识字率、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等可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经济社会指标,都存在较大差异。各类地区间、各类地区内部、各省级单元间、各省内部均存在较大差异。从时间看,中国工业化40年的进程中直存在的地区差异。

第三,地区之间的差异缩小,九十年代初期出现反弹。五十年代初期是建国以来工业化地区差异最大的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两次调整,工业化地区差异逐渐缩小,但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有反弹。

中国省级单位面积很大,省内各县之间的工业化差距也很突出。因此,上一章的比较仍是粗线条的。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必须以县为地区单元,对国家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作进一步的描述。第三章按照划分县城工业化阶段标准,将全部县划分为三种类型,分析了在1985—1994年期间各类县之间、工业比重最高百县和最低

百县之间县域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根据县域经济包括的范围,我们确定划分县域工业化阶段的标准为: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大于等于80%为一类县,大于等于60%、小于80%为二类县,小于60%为三类县。按此标准计算,在统计的2147个县级单位中,1994年全国一类县为290个,二类县为614个,三类县为1243个,一二类县数量占全部县的42.1%,人口占全国的51.2%。各类县的数量和人口与上一章以省为地区单元计算的结果是吻合的。各类县遍布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平原、丘陵和山区,但中西部地区三类县更多一些,丘陵地区和山区三类县比重更高一些。一二类县多数分布在城边、海边和江河边。各类县在各省区市的分布极不均衡,一些地区的一二类县比重较高,一些地区三类县比重较高,宁夏、西藏和海南没有一类县,三大直辖市没有三类县。

我们比较了各类县工业比重、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城市化程度、非农化程度、农民收入、年末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平均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平均每万人中小学生在人数等指标的绝对差距、相对差距和总体差距,还考察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百县和最低百县的有关统计指标,各类县工业化进程差异表现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各类县之间差异悬殊。各类县各项经济总量指标普遍地增长较快,但水平差异和速度差异很大。各类县经济总量为全部县平均数的百分比差距,各类县人口与经济总量的相对比重差距也很大。各类县非农化和城市化程度普遍偏低,但差距较大。总体判断,各类县之间工业化非均衡程度比各类省之间工业化非均衡程度要高。

第二,在1985—1994年期间,各类县之间多数工业指标和其他经济总量指标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扩张的幅度也比较大。这种变化趋势与各类省市区之间差距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扩大的幅度也差不多。考察的医院床位数和在校学生人

数两项社会指标,各类县之间差距不大,但水平偏低。

第三,农村工业化进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大,乡镇工业成为中国工业化地区差异的重要贡献因素。我们考察了从1985年到1994年各类县全部农村工业从业人数和工业总产值及乡办、村办工业从业人数和总产值指标的变化情况,还分析了各类县的农村非农产业的从业人数、营业收入、国家税金、纯利润、固定资产净值、建筑业产值、运输业产值、商业饮食业产值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农村工业化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各类县农村工业化进程差异比县城工业化进程差异更大一些;乡办工业的非均衡程度大于全部农村工业的非均衡程度,村办工业的非均衡程度大于乡办工业的非均衡程度;与各类省市区及县城工业化的变化趋势一致,各类县农村工业化进程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

第四章分为五节,通过对1985—1994年间各类县之间农业投入、产出、生产力和产出剩余流转等方面差异变化的对比,探讨了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结构发生变化,重心转移。在投入结构中,土地和劳动投入呈减少的趋势,一类县减少最多,二类县次之,三类县减少的幅度最小;资本投入,一类县增长最多,二、三类县次之;在种植、林、牧、渔业结构,粮食和非粮食作物结构和粮食品种结构中,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种植业比重下降,粮食作物下降,大宗粮食品种比重下降;当地传统的大宗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一类县处于萎缩时期,二类县已经开始萎缩,三类县处于全面上升时期。各类县农业结构的差异变化,是工农业关系演化的一个结果;从投入看,对农业土地工农业双方争夺,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业失去的土地越来越多,农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双方推让,各类县农业劳动力下降缓慢;工业化改变着传统的食物消费结构并密切了工农业的联系,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以效益为取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各类县的农业增长与贡献因素也是有差别的,农业总产出增

长率,一类县最高,二类县次之,三类县最低;从农业增长的来源看,一类县主要受益于生产力的增长,二、三类县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按投入和生产力分别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划分,一类县属于“内含增长型”扩大再生产,二三类县仍属于“外延增长型”扩大再生产;种植业产出增长,一二类县完全依靠土地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三类县主要依靠土地生产力的增长来实现,同时也有一部分属于耕地面积增长的贡献。分单项生产力看,同样,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也是一类县最高,二类县居中,三类县比较低。土地生产力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是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同时,二三类县也有少部分贡献来自复种指数的增长;由于地劳比例逐年降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完全依靠土地生产力增长的贡献;资本生产力的增长是下降的趋势。各类县之间农业增长贡献因素的差异,是由于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各类县,在科学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业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差异影响。

工业化非均衡进程对农业和非农业产出剩余流转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通过对全国农业和非农业产出剩余流转方式和数量的分析发现,近年来,虽然工农业比价差距缩小,但由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使工农业产品比值剪刀差仍维持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上,同时农民买卖工农业产品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农业剩余净流失的总量迅速增加。在三种类型县中,一类县净流出最多,二类县次之,三类县略低于二类县;一类县由于工业化程度及农业商品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农民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数量多,通过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剩余也就多。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储蓄额增加,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存贷差扩大,这一部分储蓄最终流向非农业。相反,在工业化程度最低的三类地区,由于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的数量很少,储蓄和农业税收也不多,因而农业剩余的净流失少于一二地区。

第五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讨论了发达地区出现的农业传统产品萎缩现象和原因;第二节根据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分别评论了农

业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两种主张的利弊,给出了适度的农业支持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建议;第三节从上述政策建议的角度讨论了近年来剪刀差变动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思路;第四节讨论了在适度的农业支持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相结合的政策中,各类地区不同的政策目标、重点和策略。

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农业传统产品产出相对减少或绝对减少与非传统产品产出迅速增长,这种工业化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可以概括为农业传统产品萎缩。其原因,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市场需求的拉动、要素成本的推动和生产者利益的驱动三种动力的综合影响;这三种动力的综合作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从一类地区到三类地区依次递减,影响最大的是一类地区。另一方面,在市场作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发达地区对农业支持不得要领,过度放任市场作用,缺少调控和引导,使传统产品萎缩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地区传统产品萎缩问题,几乎浓缩了近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所有矛盾。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单纯依靠传统的农业保护,也不能完全指望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农业保护对于实现农业发展、保证食物有效供给和农业收入稳定增长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其主要弊端是加重财政负担,扭曲市场价格均衡,降低产品竞争力。从粮食安全、土地资源的限制和稳定农民收入方面看,我国对农业进行保护是无可置疑的。从比较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基本经济实力看,对农业实行保护也是可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可以导致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使福利收益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稳定。同时,这种自由贸易体制是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基础的,而这个理论本身是有缺陷的,在我国的实践中也难以完全行得通,在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规模效益不足的夹击中既难以增加粮食供给总量也难以保持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流通量的增长将受到交通运输能力的严重约束。妥善的农业政策应该是适度支持与建立相对统一市场相

结合,农业支持与建立统一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是一致的,而不应该相互对立和排斥。农业保护和建立统一大市场都是手段,应该扬长避短,互为补充。从财力限制、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条款的约束看,我国农业保护是有限度的,重点是保护粮食生产,主要方式是间接保护。从传统农业保护的经验和含义及我国农业保护的、范围和力度看,称为农业支持更符合实际。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市场只能是相对的统一,而不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如在市场的统一性、分工、市场价格形成和管理机制、国际贸易、要素流动和市场信号等方面,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在共同发挥作用。

在实施适度的农业支持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相结合的政策中,应该注意解决工农业产品比价剪刀差问题。目前,农业剩余净流出总量不断膨胀问题特别是剪刀差问题仍然是工农业关系中矛盾的核心。农业剩余净流出增加有两个基本原因,即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拉大和工农业产品交换总量迅速放大。与工业化国家比较,我国解决剪刀差问题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道路可能更艰难一些。这个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府的干预,也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解决我国工农业剪刀差问题的目标模式和策略应该是: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举,增加农业产出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举,努力在21世纪上半叶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适度农业支持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相结合是适用于全国的农业政策,对于工业化不同程度的各类地区来说,无论政策目标、政策重点还是政策策略都应有所区别。各类地区比较优势不同。大体上的农业分工应该是,一类地区以非传统产品为主,二类地区传统产品与非传统产品并举,三类地区以传统产品为主。在速度上,各类地区的上述主导产品增长应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支持的范围、方式和力度也有区别。一、二地区农业支持的重点是:政府要全面认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保护农业资源,支持

农业现代化建设,三类地区重点支持基础建设,如交通运输、通讯和信息传播设施及农田基本建设。在统一市场的建立方面,一类地区主要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迎接国内外“后进”农业和“先进”农业的挑战。三类地区主要是通过基础建设扩大市场和通过实行农业产业一体化解决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问题。三类地区要走农业→农产品加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农业积累资金发展工业。该类地区实行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基础条件逊色于一二类地区,在产业化经营中应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化推进的速度应该比一二类地区慢一些。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致谢

本书从主题酝酿、文献研究、开题设计、资料收集与计算整理、调查研究到初稿完成和最终定稿,历经4年。它的初稿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是在我的学位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牛若峰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论证、结构安排到写作大纲的准备,先生均给予了具体指导。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暇认真审读了论文全稿,不但提出了多处重要修改意见,而且对一字一句,乃至标点符号逐一进行了斟酌或修改。在论文阅卷和答辩过程中,许多专家和学者对书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是(按姓氏笔画为序):刘志澄、冯海发、朱希刚、严瑞珍、何煥炎、张塞、韩元钦。在学位论文准备过程中,王广森教授、李玉珠研究员、阎守邕研究员、韩永文博士和赵芝俊同志等在参考书或研究资料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

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分县统计数据的整理、计算与核实方面,我得到了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赵建华和张义同志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本文第三章以县为地区单元对我国工业化非均衡程度进行量化的研究内容将难于完成,建立在这一章基础上的第四、第五章的研究计划也很难进行下

去。

中国统计出版社编辑部顾建辉主任和吕军同志组织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没有他的全力帮助,本书难以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在这里要提到我的妻子王娟。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她在时间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同时,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她以良好的经济理论修养,对本书提出了一些中肯意见,使我获益匪浅。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在这里必须提到,那就是我的兄长徐志安。自我少小离家后,28年来他一直与我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思想方法和如何做人方面对我影响很大,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也给予了鼓励 and 关注。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的直接领导朱向东同志多年来一直把工作人员在职攻读学位作为一项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的战略性工作,而我是这项工作的受益者之一。在本书完成的过程中他也给予了极大的关照。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上述为该书的完成提供了直接或间接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 者

1997年6月初稿

1997年12月修改稿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OICE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CHINA

ABSTRACT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ut the extent of unevenness var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China,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t present, a small number of regions have entered the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matur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regions have entered the mid-term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stage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while a number of regions are still at the starting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stage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funds and high 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re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coexist in China. As a result, the extent of unevenn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s rarely found in the worl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hre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has very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 It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different policies for th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industrialization, deal with them in different ways and guide them with different methods.

How to classify the regions into the above three categories and how to guide them with different methods are important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eriously studied and solved. In line with this requirement, the theme of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ositivist method is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Three problems are answered: (1) How to quantify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what is the situation? (2) What is the effect of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3) How is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riented i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has six chapters: (1) Chapter I: Introduction, (2) Chapter II: A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s of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with Provincial Level Unit as the Area Unit, (3) Chapter III: A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s of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with County as the Area Unit, (4) The Effect of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5) The Choice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6) Conclusions.

To classify the regio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first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tandards for classification. For this purpose, we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Chapter I, taking th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and then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concept of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alculation standards are defined and in the third sec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described.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r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tages: (1) the starting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stage of high 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funds, (2) the mid-term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stage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and (3) the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 e. the matur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re indicator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Wh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t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r value added) to the net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or value added) in a region is less than 60%, the region is classified into the firs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hen the proportion in a region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60% but less than 80%, the region is classified into the second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hen the proportion in a region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80%, the region is classified into the third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inciples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extent of unevenn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re as follows: (1)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 is able to show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gratedly reflect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2) It is also able to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3)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limited data resources and all the indicators selected should be measurable; (4)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 should include adequat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 includes: (1) the core indicator, i. e.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2) the major supplementary indicators, such as per capita GDP, level of the non-agricultural process, urbanization level, consumption level, per-

centage of school-age children enrolled and the number of health technical personnel, etc. and (3) additional indicators.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social indicators and the dynamic indicator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static indicator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iz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relative difference and total difference, is adopted. With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s are made respectively with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and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as the area unit.

Applying the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Chapter II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and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the area unit us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s of three categori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uneve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re analyz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started in 1953. Aft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38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t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to the net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was 60.5% in 1991. It meant that China as a whole country had passed the firs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ntered the second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year. In 1994, the number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units belonging to the regions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ategories in the whole country was respectively 3, 11 and 16.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the three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regions of the first category. Regions of the third categor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Although the number of the provincial